

·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建 国 以 来

世界史研究概述

陈启能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

陈启能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北京

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

陈启能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22.75印张 590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定价：7.80元

ISBN 7-80050-177-9/k·3

目 录

总论：成就、不足与展望	陈启能 (1)
世界史理论、方法及外国史学史的研究概述	王晴佳 (24)
1986—1987年的史学理论研究述要	王也扬 (54)
历史比较研究概述	侯建新 (80)
世界古代史研究概述	于 可 (111)
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概述	郭 方 (155)
西欧近代史研究概述	武克全 (170)
西欧现代史研究概述	杨丽华 (206)
东欧史研究概述	康春林 (230)
苏联史研究概述	于 沛 (265)
朝鲜史研究概述	冯鸿志 (315)
东南亚史研究概述	徐钧尧 (331)
印度史研究概述	黄思骏 (354)
西亚近现代史研究概述	朱克柔 (422)
日本史研究概述	汤重南 (439)
非洲史研究概述	彭坤元 (488)
拉丁美洲史研究概述	萨 那 (511)
美国史研究概述	黄柯可 (5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概述	李巨廉 (590)
国际关系史研究概述	石 磊 (616)
国际共运史研究概述	高敬增 高放 (654)
后记	(719)

总论：成就、不足与展望

陈 启 能

—

如果把具有悠久传统的我国史学比作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的话，那末世界史这门学科则是这棵大树上的一枝新枝。解放前，在我国的高等学府里，虽然也有人讲授世界史，主要是西洋史，但真正坚持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堪称凤毛麟角。有些学者从国外留学回来后，本想在开创世界史研究方面一显身手，但迫于资料匮乏、资金拮据等种种困难，不得不改而攻研中国史。在成果的出版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总的数量本来已经不多，而且其中主要又是翻译作品，或者是带政治性的、时事宣传性的著述。因此，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史实际上是在解放后才建立起来的。

这门新学科的基础虽然薄弱，在成长过程中又屡遭挫折，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暴风雪几乎把这根新枝压断，但综观近40年来的发展，毕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界史学科从建国以来近40年的发展历程，明显地表现出其阶段性。有人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有人分为两阶段，实质上是一致的。分为三个阶段，是把1949至1966年作为第一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或奠基阶段；1966至1976年为第二阶段，即停滞阶段；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至今天是第三阶段，即复苏和发展的阶段。有人则把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种分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史学科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讲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要了解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概况，主要指的正是最近这十年。因此突出1978年作为界限是有道理的。本书的内容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

鉴于本书各篇文章已分门别类地对世界史学科各领域作了详尽具体的综述，我在这里只能就世界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趋向，作点简单的概括和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建国以后，在50年代初，世界史学科首先在高等学校里建立起来，以后直到1966年，可以说，始终处于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就，概括地说，都带有初创的特色。譬如，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初步形成，研究机构的初步建立，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图书积累等都处于初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就表面看来并不显赫，但万事开头难。对这一阶段的奠基性工作，我们应该予以肯定，给以恰当的估价；对在这一阶段辛勤工作、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历经沧桑的老一辈史学家，理应表示敬意。正是他们的奋斗，为1978年以后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谈到这一阶段的成就，除了上面列举的几个方面外，有几点需要特别说一说。首先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整个学科的指导地位。正因为世界史学科是在建国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因而这门学科从建立时起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世界史学科同历史科学中其他学科（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有所不同。世界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相对来说，旧的传统的负担要比较轻些，封建史学观点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点的影响可能也要比较小些，队伍的结构也显得简单一些。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已非昔日可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而国际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世界史，也就受到各方面的注重。专门研究世界史的中央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成立就很

说明问题。1959年,当一批在苏联学习世界史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就以其中的一部分人为基础在历史研究所内成立了世界史组。到1964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世界史所和其他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相继成立。在世界史所的成长过程中,史学界的前辈灌注了心血。他们的热心扶植和栽培值得记载。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历史研究所初期侯外庐教授的亲切关怀和后来陈翰笙教授的直接指导。可以说,整个世界史学科的迅速成长,同老一辈史学家的关怀、扶植、指导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这门学科在基础薄弱、外界干扰又多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由于世界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虽然象新生儿那样比较幼稚软弱,但同时却也具有一种先天的优势。这就是说,它在成长中,既可以借鉴历史学在以往发展中走过的弯路,避免重蹈覆辙,又可以直接吸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对我国世界史学科来说,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它在发展的初期,就没有受欧洲中心论一类观念的束缚,而是努力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兴起的国际形势相一致,我国世界史学科从开始时就注意开拓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这是很有眼光的一步。从史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对亚非拉美史的研究,我国同国际史学的步伐大体上是一致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总结当代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指出,“大致从1960年起,西方学者对东方历史和非洲历史的研究明显地加强了”^①,他还特别强调,这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家^②。

这个事实表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起步的时候,在某些方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面的起点是不算低的。总起来看，上述几个方面正是它发展的有利条件。如果能够发扬这些长处，获得顺利发展，不难预料，它必然会缩短与国际史学的差距，取得更多的成就。不幸的是，它的发展遭到当头痛击，以致几乎夭折。正当“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把历史女神打入冷宫，广大史学工作者不再有可能在科学殿堂里潜心攻研，而被迫在“广阔天地”里“斗批改”的时候，国际史学却从6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论在研究领域的开拓，还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更新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两下一差，我国世界史学科同国际史学间的距离就更拉开了。

如果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反思，世界史学科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停滞，固然是由于遭到外来的打击，但却同它在前一阶段发展中本身的内在不足也是分不开的。简单说来，这些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束缚。这当然是当时整个史学界的状况，世界史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幸免。其次，闭塞隔绝。建国以后我们对西方史学一直采取简单的否定排斥的态度，60年代以后对苏联史学也从肯定仿效转为否定排斥，到十年动乱时期同国际史学就完全隔绝了。第三，不注重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而是一直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60年代初期，当苏联史学界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方法法的关系问题，并尖锐地提出要大力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时，我们虽然及时作了报道，但显然把它作为一种“离经叛道”的错误倾向对待的。总之，世界史学科在第一阶段发展中本身的这些严重不足，在十年动乱中得到恶性发展，结果更使自身遭到严重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世界史学科很快复苏，在短短的十年里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这十年里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本书各篇文章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概括地指出几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教学方面。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本学科的教学。而且教学的基础又在于中等教学；中等教学搞不好，高等

教学也很难发展。30年代时，苏联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取消历史教学的错误，除了决定恢复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系以外，重点抓中学的历史教学，特别是教科书的编写，这个情况恐怕也能说明问题。从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学世界史教学的状况虽有改善，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50年代时，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各有一年学习世界史（共四学期），其中在1953—1956年还曾达到初中、高中共有六个学期学世界史的。不过当时的教材基本上以苏联教材为蓝本。进入60年代，由于中小学学制由12年制改为10年制，所以从1961年起，初中就不再设世界史课了。到了1964年，课程进一步缩减：整个中学五年只在初三设历史课，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合编一册，共60课时。当时编的教材内容十分贫乏。可悲的是，连这种可怜的情况到十年动乱时期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学历史教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近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法以来，根据国家教委的新教学计划，初中阶段要开设三年历史课，其中一年为世界史。高中也恢复了世界史课程。在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方面，成绩更为显著。不仅为中学生编写了教材，而且编写了中等师范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使用的世界历史教材，供培训在职历史教师用的世界史的卫星电视教材也正在编写中。除了普通中学外，还开展了职业中学、成人职工高中的世界史教学。这些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师资的质量和数量都不够，经费短缺等等。

世界史的高等教学在十年动乱以前基础就很薄弱。经过十年动乱的折腾元气大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复苏。到80年代中期，全国和地方的综合性大学、地方专科大学、师范院校和师专等约有三三百所，大多设有历史系或历史专业，一般都讲授世界史课程，但高校历史系设有世界史专业的只有三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未设专业但世界史师资较强或设有世界史研究机构的，约有二十所左右。这个情况表明，比起前一阶

段来，高校的世界史教学虽有了发展，但总的来说基础仍很薄弱，同时发展不平衡，在教师队伍、图书资料、教材编纂等方面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到80年代中，在世界史学科方面，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点数共有16个，导师23人，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4个点，6位导师；世界近现代史，7个点，9位导师；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5个点，9位导师。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点数共有60个，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17个点；世界近现代史，18个点；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25个点。至1986年共培养出历史学硕士410人，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85人，世界近现代史130人，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195人。这批新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目前已在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方面，相对来说，成绩要明显一些。例如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到80年代中期，有关世界史的论文总计约有1万2千篇，其中约有一半左右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的。有关世界史的专著也出了一批，其中有些有相当的质量，在国际上也引起反响。详细情况在本书的有关文章中都已介绍。除各个历史杂志和各高校学报扩大了刊登世界史论文的篇幅以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专门的世界史刊物，计有《世界历史》（1978年创刊）、《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创刊）、《世界历史译丛》（1979—1980年）、《外国史知识》（1981—1986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等，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不定期地出版过有关世界史的期刊。此外，还先后成立了16个有关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会，许多研究会都出版会刊或通讯，经常发表会员的研究成果。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世界史专题讨论会经常举行，在活跃学术气氛，推动学术交流方面起了

作用。不少地区社科院和许多学校内还成立了有关世界史专业或专题的研究、教学机构。所有这些都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上，也就是表现在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上。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被相继开拓了出来。由于世界史学科原先的基础比较薄弱，因而这点表现得格外明显。世界史研究在新时期开辟的新课题，其数量要大大超过前一阶段。譬如印度史研究，在前一阶段的课题大约只有五六个，现在已有20多个。其他领域新辟的课题也很多，下面随手举些例子。例如在美国史领域，美国的移民史、妇女史、政治制度史、两党制史等都是近年新开辟的；在日本史领域，近年新辟的课题有日本封建社会特点、自由民权运动、法西斯主义、战后史等。许多新课题的开拓，大大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不少空白。一些重要的领域，如东欧史、战后史等，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空白，近年来已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在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中，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那就是其中有些过去曾被视为“禁区”的，现在也被打破了。譬如苏联二战前的外交问题，其中包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党内反对派问题；共产国际评价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学的复苏（自然包括世界史学科）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号召下实现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为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指明了道路。历史科学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准则，那么它就会失去生命力，就很难在社会现实中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而且取得不少成绩，其中有些成绩还很有影响。譬如，关于布哈林问题，早在1981年就有论文发表，许多根本问题都已提了出来。这比苏联史学界

早了七八年。但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成绩。同时必须明确，任何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点上不能有丝毫含糊。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研究和宣传是要区别的，研究不应有禁区，宣传则需要根据政策和具体情况适当的掌握。

在新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中，还有一个新气象也是应该一提的。那就是学术争鸣的开展。当然，在五六十年代时，有关世界史的许多问题就开展过争鸣，但无论是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争鸣的气氛都远比不上1978年以后。学术争鸣是研究工作深入下去的必要条件。尽管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学术争鸣的热烈却是空前的。1985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附有《建国以来世界史问题讨论简介》的资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83年上半年以前有关世界史各种问题争论的情况，其中大部分文章发表在1978年以后。本书的各篇文章又补充了1983年以后的争论开展情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争鸣的开展确是近十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学术争鸣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争论的面虽然很广，但真正深入下去的却不多，大多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争鸣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近年来争鸣的开展和讨论气氛的热烈是应该肯定和发扬的。

第四，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的进展，就是对史学本身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开展。这个成绩当然不只属于世界史学科，而是同整个历史科学有关的。但在谈到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时，也需要专门提到它。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在经过十年动乱对历史学的摧残以后，我国的史学工作者需要从理论上对史学本身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过去闭关锁国的状况，国外史学理论的新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研究。从1984年至1987年已连续举行了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各届讨论会的主题分别是：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第一届);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第二届);历史方法论(第三届);历史认识论(第四届)。1988年的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将讨论社会形态问题。其他各种类型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专门的《史学理论》杂志已于1987年创刊。有关外国史学理论的译著以及国内学者撰写的专著和《史学概论》已出版多种。这些都说明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这虽然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整个研究也还只处于初步阶段,但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这里只想提出两点:一是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但不能替代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论。过去曾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除此以外,历史学就无理论和方法论可言。这样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理论,而是用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来替代。这个问题不解决,史学理论的研究就难以迈步。只有明确了两者的关系,局面才能改变。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但这已是下一步的工作了。另一个成果是,明确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关系。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种种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多样性和统一性、社会形态演变等等),史学理论则是指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包括同主体有关的问题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也包括历史方法论问题等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但过去我们只研究历史理论问题,很少涉及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在史学理论问题中,也是谈方法问题多,而很少涉及历史认识问题。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强调史学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同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总起来说,在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理论(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历史认识的理论问题)之间的关系之后,史学理论以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才被突出出来,这样也就为今后的加强研究

开辟了广阔前景。回顾近几年的研究，有关史学理论的各种问题都已提了出来，关键是要认真深入地研究下去，特别要注意把理论的研究同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强调的跨学科研究是这样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五，打破了同国际史学界封闭隔绝的状态，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和同港台学术界的交流。这当然也不局限于世界史领域，而是适用于整个史学界。但世界史作为专门研究外国历史的领域，同外国学术界的交往理应格外重视，因为这是同研究对象国的直接接触。

打破封闭隔绝状态有两层涵义。一是对国外的史学发展不仅有所了解，而且有切合实际的科学分析和评价，这样才能既认真吸取国外史学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又注意批判其中一切消极因素。时代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科学、文化要想真正获得发展，都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惜，对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是在付了重大的代价以后才开始认识到的。可以说，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以一种比较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国外的史学发展。这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这是认真的学术交流的必要的前提，也是我国史学摆脱自我封闭状态的重要转折。当然，交流和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博采众长，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的史学。因而，闭关自守和食洋不化，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同样都是错误的。对西方的史学理论，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分析批判研究消化。

二是具体学术交流的开展，包括人员之间的交流、图书资料的交换、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外史学家各方面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发展很快。过去那种隔绝状态已有了根本改变。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中国史学会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之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受我国代表团的申请，接纳我国史学会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国。1985年8月，中国史学会第一次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集体成员，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他有我国史学家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就更多了。除了人员交流以外，我国还有许多留学生在世界许多国家学习历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约有一百多名中国的留学人员在美国进修学习历史学。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等也都有我国的历史学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同香港台湾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近年也有发展，但涉及世界史领域的还很少。在历史学的国际交往方面，我们虽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需要来讲，无论是同国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还是图书资料的收集交换，或者参加国际会议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是很不够的。我们期待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二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成绩是显著的，无法否定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现象，即世界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却也遇到了许多困难。这表明世界史学科（整个史学也是如此）似乎又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这困境的表现是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历史学似乎越来越遭到社会的冷淡：历史学著作销售量小，出书困难，常常因为征订数太小而无法开印；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常常分不出去，或者不得不改行，学非所用；历史学著作虽然出了不少，但基本上只在同行中流转，没有多少社会影响，等

等。一句话，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社会功能显不出来。在整个历史学中，世界史学科似乎比起其他学科还稍好一点，但基本上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在1983、1984年的时候，当历史学还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已有一些敏感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尖锐地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尽管这呼声并不为许多人所接受，但它却是针对史学所处的困境而发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一边是显著的无法否定的成绩，一边又是明显的、同样也是无法否定的种种困难。成绩与困境并存，进展和困难同在，这是怎么回事？

这需要作些分析。自“史学危机”的提法提出以后，引起了种种争论。首先一个问题是，史学究竟有没有危机？如果有的话，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何克服？主张危机论者，强调史学遇到的困难，史学同社会需要的脱节。反对者则又强调史学近年来的成绩，认为史学遇到的困难还不足以构成危机。这中间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学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成为“显学”，不能要求史学发挥太大的社会功能。因此，纵然不能为史学的现状心安理得，至少也不必大惊小怪，提出过高的要求。如果不拘泥于“史学危机”这个提法，不去抠字眼的话，那末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实际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大家都承认史学近年来的成绩，也都承认史学遇到的困境。分歧似乎在于对困境的程度的估计上，也就是能不能把它称之为“危机”。这里有一种顾虑：如果承认是“危机”，似乎就把成绩都抹煞了。其实这是多虑的。只要查一查我国的《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就可看到，“危机”的第一义都是“潜伏的祸根”或“危险的祸根”，其后才是“严重困难的关头”或“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当然，这两重意义也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潜伏的祸根只要不加注意，就会发展下去，终有一天难免酿成严重困难、陷入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这里，如果我们把危机理解成“潜伏的祸根”，那末有条件地承认“史学危机”的存在似也未始不可。这既不否定史学近年取得的明显成绩，又敏锐地指出潜

在的危险,敲响警钟,有什么不好。青年史学工作者几年前就敏锐地提出“史学危机”的口号,以表达他们对变革史学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希望史学更好地与时代同步、为现实服务的热切意愿,这是应该肯定的。

或许是由于我们过去多年来习惯于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因此总是怕谈不足,更怕谈“危机”。其实,“居安思危”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不论取得多大成绩,总还会存在不足和缺陷,这些不足和缺陷就是潜伏的祸根。及时地对它们敲起警钟,才会唤起人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去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变革。因此,危机感实际上是一种追求不断进步的推动力,是改革要求的起点。人们常常把危机同时看作契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和我们不同,西方人似乎并不忌于说危机。在西方史学界,“史学危机”的呼声常有所闻,至今不绝于耳。当然,西方的史学危机主要是由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造成的,和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虽然西方史学家们在呼喊史学危机时,未必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指历史观说的,但这呼声表达了他们对史学现状的某种不满和要求革新和改进的愿望。这是他们的危机感的一种反映。

至于说到我们的“史学危机”,这里指的是潜在的祸根,也就是历史学本身内在的不足和缺陷。如果要用“危机”的说法,那末这也不是全面“危机”,而只是局部“危机”。因为历史学并不是处在全面停滞、严重困难的关头,它还在发展,还在取得成绩。既然是局部“危机”,那么是什么“危机”呢?有人说是理论和方法的“危机”。因为历史学在本身的理论建设方面十分落后。它要不就是满足于繁琐的考订和对事件的描述,要不就是用教条式的理论框架去剪裁历史。在方法上则又是十分陈旧。也有人说是历史学未能适应当前时代需要的“危机”,实际上也就是“功能危机”。历史学未能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未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因而自然就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冷淡。另有人说是内容